

古稀之年

# 索尔兹伯里的“长征路”

·杨丽娟·



左:1984年4月,在都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合影(右起:索尔兹伯里、谢伟思、秦兴汉);中:索尔兹伯里夫妇在泸定桥;右:到达吴起镇时秦兴汉与索尔兹伯里

40年前,一个三名团员、平均年龄73岁半的美国老年团,全程自费,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,历时74天,完成自己的长征。第二年,《长征:前所未闻的故事》(简称《长征》)面世,感动世界。其作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曾被苏联禁止入境,惹得五角大楼雷霆万钧,偏偏对长征念念不忘。

1937年,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只用了一个章节写长征,他意犹未尽,“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。”索尔兹伯里完成了好友的心愿。

## “心中之麦加圣境”

老年团的核心人物是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,时年76岁。随行的译员张援远看得很清楚,他的右胸前有一个微微突出的方块,那是早年的心脏起搏器。张援远并不知道,索尔兹伯里把中国称为“儿时及今心中之麦加圣境”。

1929年,明尼苏达大学化学系学生索尔兹伯里毕业在即,写信给姨妈:“我已经大致决定要到中国或日本去找工作。”然而主编校报的索尔兹伯里因触犯校方,惨遭开除。大学肄业赶不上大萧条,中国肯定是去不成了,他决定进合众社当记者。

二战的硝烟把他的脚步引往世界各地,偏偏中国一直错过。他在莫斯科遇到埃德加·斯诺。索尔兹伯里早已读过《西行漫记》,与斯诺的交谈,让他对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这些名字愈发着迷,对中国红军的长征壮举更是神往不已。

1949年12月,毛主席出访苏联,索尔兹伯里作为《纽约时报》驻莫斯科记者,找到中国大使馆,留下一封给毛主席的信,请求访问中国。从那以后,他每年都写一封信给周总理或者中国外交部。

1972年,尼克松访华,带了70多名随团记者,索尔兹伯里却不在名单上。这很大程度是因为,1966年,越战正殷,索尔兹伯里深入越南腹地,发回一线真相,惹得五角大楼暴跳如雷。

1972年6月,索尔兹伯里终于如愿踏上中国的土地。

## “我们是发了神经病”

1972年6月16日,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美国客人,他对索尔兹伯里表达歉意:“对不起,我们没有能早日接待你。”索尔兹伯里不失时机地提出:“我非常想寻访当年长征的路,和那些幸存者谈一谈。”可周总理不置可否,只是用揣摩不透的探询目光看着他。多年后,索尔兹伯里才理解周恩来的目光,他自嘲道:“我太天真了!难怪周恩来会以蒙娜丽莎式的笑意看着我。我不知道‘文化大革命’还远未结束。”

一直等到1983年8月17日,中国方面打来一个电话:您对长征之路还感兴趣吗?索尔兹

伯里惊喜万分,年近70的夫人夏洛特却惊恐不已:索尔兹伯里已经75岁,还戴着心脏起搏器,还有74岁的杰克·谢伟思,几年前犯过一次心脏病,也将与他们同行。

1973年,索尔兹伯里偶然结识谢伟思——一位有名的“中国通”。1944年,作为美军观察组的一员,他前往延安,并在中共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晚宴上,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毛泽东。

一次,谢伟思邀请索尔兹伯里一起沿长江徒步旅行。后者立刻“推销”他的长征计划——这可是“旅行的一大妙计”。索尔兹伯里回忆:“我知道得越多,就越想摸清毛泽东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艰苦历程。我得从头入手,这就是长征。”

夏洛特只能向丈夫的热情妥协,她在去往北京的飞机上写道:“我想我们是发了神经病,不管我们是否会活着回来。”

## 坚持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

1984年3月1日,索尔兹伯里夫妇飞抵北京,谢伟思半个月后跟他们会合。

3月6日,他们夫妇在军事博物馆见到副馆长秦兴汉。在索尔兹伯里眼中,秦是他早已相中的长征向导。1983年,秦兴汉陪美国记者汉森访问了长征的一段路程。索尔兹伯里中国之行前,汉森向他推荐了秦兴汉。因腿部静脉曲张,秦兴汉一开始婉言谢绝。索尔兹伯里不罢休,通过总政治部提出此事,秦兴汉这才答应。

第一站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后,一行人前往井冈山,索尔兹伯里开始了他的“车上座谈会”——他拒绝乘坐地方政府提供的舒适小轿车,只坐宽敞的面包车。因为这样,一行五人和地方领导才能坐进同一辆车,方便路上边走边谈。

对于每个含糊的细节,索尔兹伯里从不怕耽误时间,坚持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。长征中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:

他那次访问我时,忽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——李德的面部肤色如何?我说他是欧洲白色人种,面色自然是白的。作家又问:“那么他有没有发红的时候?”我说那自

然也会有的。他马上又问道:“在遵义会议上红过没有?”我说红过。他紧接着追问:“你能不能说说,他在什么情况下发红,又在什么情况下发白?”我想了想道:“在我的印象中,博古发言的时候,他有些脸红;到毛泽东发言时,他又转而发白了。”作家一听就高兴地说:“好,有了这个细节,就把李德当时的心理状态反映出来了。”

或许是预料到采访的尖锐甚至敏感,刚到中国,索尔兹伯里就郑重其事地提出,全程费用必须自己支付。一行5人就这样走过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、甘肃和陕西。

## 皎平渡突发心脏病

皎平渡,因红一方面军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北而上而闻名。5月8日早上5点,一行人开始了前往皎平渡的徒步跋涉。15公里的碎石路越走越险,索尔兹伯里左右摇晃,重重地摔了一跤,夏洛特骤然感觉膝盖不能弯曲,旁边陪同的年轻人想帮忙,却无从下手,只好同情地说,“you are crippled(你们瘸了)”。

谢伟思和张援远最先到达江边渡口,边吃饭边等大队人马。下午2点左右,人终于到了。张援远记得,索尔兹伯里“眼睛都没光了”,含糊地嘟囔:“I'm finished, I see my Long March is crumbling.(完了,我眼看着我的长征要垮掉了。)”他赶紧找人给索尔兹伯里测血压,安排休息吃饭。夏洛特倒在床上,整整睡了一下午。而索尔兹伯里却坚持去了江边,他找到当年帮红军渡江的老船工张朝满,问东问西。这才有了《长征》中满是细节的故事:

所有的船都给藏起来了……他们在江边找到了一只半沉在水中的小船……他们后来在江对岸又找到了一两只船。这么一来二去,总共弄到了五条船……

他们又运了一两船战士到达对岸四川地面,在那里他们对当地的厘金局据点发起了突袭。他们把厘金局的大门敲得梆梆响,因为红军战士不会说当地方言,就让船夫们用四川话叫道:“你们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走了,不交税了。”听到这里,门一下子开了。红军一涌而入,里面

有几个人正在打麻将、抽大烟,他们很快被解除了武装。

第二天的返程路却是上山。浑身僵硬的索尔兹伯里夫妇实在走不动了,只能借助担架和骡马。在会理吃晚餐时,索尔兹伯里自我感觉好了很多,端着杯子难掩兴奋:“我们来到皎平渡才真正体会到红军长征的伟大!”

不料,那天半夜,他突然浑身发冷,夏洛特让他服了阿司匹林,喝了开水,给他盖上房间里所有的毛毯。他出了一身大汗,虚弱不堪,脉搏也不规律。

“没有救护车,山路太颠簸,我们就弄了一辆面包车,把座椅拆了,然后用4把椅子当腿儿,把担架固定在椅子上悬空,让他躺在车里。”张援远回忆,就这么将就着,5月10日赶到西昌。西昌的四位医生带来一台新式日本机器,验血、做心电图,结论是心脏病发作了,不排除心肌梗死。

还好,11日,医生带来好消息,可以排除心肌梗死。接待人员决定尽快到成都抢救。总算到了成都,让夏洛特意外的是,给纽约的私人医生打电话沟通后,医生告诉她,中国医生迄今采取的一切治疗措施都是正确的。夏洛特终于相信,索尔兹伯里是由于疲劳和脱水,导致心脏缺血缺氧,输氧和服药就能治好。5月18日,索尔兹伯里出院。

## 为刘志丹失声痛哭

出院后,在医生护士的陪同下,索尔兹伯里一行继续长征。跨过泸定桥,走过雪山草地,1984年6月8日,他们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,完成了“长征”之旅。站在毛泽东指挥“割尾巴战斗”的地方,索尔兹伯里自言自语说了“伟大”两个字。

在那本举世闻名的著作中,他不仅写了耳熟能详的艰难险阻,譬如只剩三分之一木板的泸定桥、“只有神仙才能飞过去”的雪山,还写了“担架上的谋划”、毛泽东重新掌权,以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“黑暗与光明”。

秦兴汉说,很多外国朋友对长征有个误解,以为红军长征开始时,就拟定了北上陕北的计划。但索尔兹伯里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认知,他写道:

毛泽东到底要把军队带到哪里去?到达哈达铺的时候他依旧没有清晰的头绪……红军先头部队到达的时候已经直接去了哈达铺的邮局…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,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员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上面的内容。他们感到欢欣鼓舞,早在两

河口跟张国焘一起开会时听到的传闻居然是真的!

夏洛特的想法有点独特,她想搞清楚,为什么红军队伍中有不少富裕家庭的革命分子?在西安见到刘志丹遗孀和女儿的那一刻,她觉得自己理解了。

刘志丹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,有一年陕北旱,地主们四处张贴告示,要求佃户照常交租。父亲也让刘志丹这么写,他说老百姓什么吃的都没有,哪有粮食交租?他找佃户一起抗议,把自家的东西没收充公。

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告诉索尔兹伯里夫妇,父亲牺牲时,穿的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军服,口袋里只有半根铅笔、几根没有抽完的香烟。他留下了一把手枪和一匹马,这两件东西被母亲送给了需要的人。“父亲唯一的遗产就是他的精神。”张援远逐句翻译刘力贞的话,夏洛特忍不住掉眼泪,最后失声痛哭。

## 《长征》终于“炼成”

1985年10月,《长征》在美国出版,立即引起轰动。1986年,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。1987年5月,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访美,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对他说,他对《长征》这本书非常感兴趣,“我从那本书里知道了杨将军的过去”。

索尔兹伯里原本以为,书中的某些篇章和断语会遭到中方反对,要求改写甚至删掉,但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发生。张援远说:“全书完整出版翻译,是索尔兹伯里没有想到的,他对我方的开放、包容和自信印象深刻。”秦兴汉则透露,有些问题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握,还是杨尚昆和黄华同志指示,只要大的方面符合史实,一些小的问题就不要管他了。

回忆录中,索尔兹伯里说:“这次长征不仅使我重温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,还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深入观察今日的中国。”“兴旺的市场城镇,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……”

这一切,都让索尔兹伯里对“打不倒的小个子”邓小平兴趣愈发浓厚。他向每个人打听邓小平的情况,并把《长征》一书的最后一章留给了邓小平。他对中国的新长征无限憧憬。

1992年,索尔兹伯里在给一位中国友人的信中写道:“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,看看广东、深圳和上海。”可惜,他的愿望变成终生遗憾。1993年5月,索尔兹伯里夫妇又一次驾车出游,夏洛特开车,副驾上的丈夫照例查看地图。忽然,她发现旁边许久没有响动,扭头一看,索尔兹伯里的脑袋向前低垂。在罗德岛高速上疾驰的汽车里,老头儿离开了人世。(摘自6月25日《北京日报》)

长征出发90周年